

● 语言与文学

#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与亨利·詹姆斯的叙事策略

陈 丽

(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情节是叙事学的核心内容,亚里斯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了逆转和认知的概念,认为逆转和认知是构成悲剧情节的重要部分。借助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论文发现,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和《金碗》这三部代表著作中,均运用了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情节的逆转,并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人物的认知,说明詹姆斯在小说情节构建方面的叙事技巧。

[关键词]亚里斯多德 亨利·詹姆斯 情节 逆转 认知

[作者简介]陈丽(1974-),女,河南安阳人,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1-0102-08

## 一、引言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向以缺乏情节而著称,因此,詹姆斯研究者们更多地是关注其作品对人物内心意识的展现,对詹姆斯的情节安排却极少研究。论文认为,尽管詹姆斯的作品中情节被弱化,缺乏外部的行为,这并不说明詹姆斯在叙事策略上不注重情节的安排。詹姆斯在其多部重要作品中,借鉴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中关于情节的叙事理论,均恰当地运用了逆转和认知,说明詹姆斯在情节构建方面的叙事技巧。

## 二、亚里斯多德的理论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奠基

之作。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总结了悲剧的六个要素,即情节(plot)、人物、思想、场景、语言和歌曲。亚里斯多德认为,在悲剧的六个基本因素中,情节“是首要的,是悲剧的生命和灵魂所在。”<sup>①</sup>他把情节定义为“对行动的模仿,”“对事件的安排”。他解释说,“事件的结构是最重要的,因为悲剧不是对人物的模仿,而是对行为和人生的模仿。而人生是由行为构成的,它的目的是一种行

Aristotle, *Poetics*. In Hazard Adams & Leroy Searle,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vol. I.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6.

为模式,而不是一种品质。”情节是西方叙事学的核心内容,亚里斯多德对情节的讨论可谓西方在叙事学方面的最早研究。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一书中,作者说道,“叙事的研讨在西方文论中有久远的渊源。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到文学的六个要素,情节居于首位。情节就是叙事之事。”

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的情节有简单和复杂两种……在简单的情节中,行动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沿着既定的路线发展,主人公的命运变化没有伴随着逆转(reversal)和认知(recognition);在复杂的情节中,主人公的命运变化伴随着逆转和认知中的任何一种或全部形式……最好的悲剧形式,它的情节一定是复杂而非简单的。”亚里斯多德在这里提出了逆转和认知两个概念,说明逆转和认知是构成好的情节的重要因素。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定义,“逆转指根据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转向其对立面的变化。”他举例说,在《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里,信使的到来原本是要让俄狄浦斯高兴起来,解除他对自己弑父娶母的担忧,结果却揭示了他的身份,造成了相反的后果。

亚里斯多德继而对认知作出了解释,“认知,就像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一样,指从不了解(ignorance)到了解(knowledge)的变化”,“与情节和行动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人物的认知”,而“最好的认知伴随着情节的逆转”。认知可以多种方式发生,亚里斯多德总结为如下几类。第一种是借助于某个标记所引发的认知,比如胎记、疤痕等,或者是诸如项链之类的物品。第二种认知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因而缺乏艺术性。比如在《依菲琴尼亚》(Iphigenia)中,俄瑞斯忒斯自己吐露了身份,说明他就是俄瑞斯忒斯。依菲琴尼亚是因为一封信件而被认出的,因而符合情节的发展,但俄瑞斯忒斯却是自己说出的,他所说的是诗人想要他说的话,而不是情节要求的。第三种认知是由于主人公看到某个物品,从而引起一种特殊的情感,通过回忆而引发的认知。例如,在《塞浦路斯人》(Cyprians)中,主人公看到那幅画不禁潸然泪下。或者在《艾尔斯诺斯的故事》(Tale of Alcinos)中,奥德修斯听到游吟诗人弹奏七弦琴,那曲调让他想起了过去而哭泣,从而引起认知。第四种

是通过人物的思考和推理得出的认知。例如,在《奠酒人》(Choephoroi [The Libation Bearers])中,剧中人说道,“来了一个很像我的人,而除了俄瑞斯忒斯外没有人像我;所以来的人是俄瑞斯忒斯。”亚里斯多德认为,最好的认知应当是由事件本身所引发的,通过自然的方式引出令人吃惊的发现。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在逆转和认知之后是受难(suffering)的场景。认知同情节的逆转相结合,会使观众产生怜悯或恐惧,而能够产生这些效果的情节就是悲剧性的。亚里斯多德指出,悲剧应当模仿“能够引起怜悯和恐惧的事件,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宣泄……而引起怜悯的是人物不应得的不幸,引起恐惧的是像我们一样的人物的不幸。”

### 三、亨利·詹姆斯的叙事策略

提到詹姆斯对叙事学的贡献,学者们大都会想到他对叙事视角的先驱性探索,很少有人研究他对小说情节的谋划。在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中,情节是首要因素,人物次之。他在《诗学》中说,“人物是第二位的。”而在詹姆斯的创作中,一般认为他的小说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而轻视

Aristotle, Poetics. In Hazard Adams & Leroy Searle,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vol. I.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5.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同, p. 57.

同上, pp. 57-8.

同上, p. 58.

同上, p. 60.

同上, p. 56.

以下简称《画像》。

詹姆斯在1907至1909年间将自己的作品有选择地分24卷出版,即著名的纽约版,并撰写了18篇序言。这些序言后来由布莱克默(R. P. Blackmur)于1934年集结成书,即《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是詹姆斯的重要理论著作。1984年莱昂·艾德尔(Leon Edel)将詹姆斯所有的理论著作集结为两卷本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其中包括纽约版序言。

情节的构造。这一说法确实有据可循。在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序言中,他明确表明人物比情节重要。詹姆斯说,

这里我试图回顾当时的想法,找回本书的萌芽。我看到的是,它绝不来自于任何精心构造的“情节”(plot)——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字眼,也不是头脑里突然闪现出的一系列人物关系、或是一个场面,它可以随着自己的逻辑,立刻铺展开来,大踏步地稳步前行,或急匆匆地快步前奔,丝毫不用编故事的人操心。我的萌芽完全来自于一个人物,一个动人的年轻姑娘的性格和形象,而所有通常构成“主题”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背景等等,则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詹姆斯在这里用“糟糕”这个字眼来形容情节。他说,

我自己经常是先有人物,后有场景——我总是过早地考虑前者,偏爱前者;这总让我觉得是本末倒置。我羡慕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能够先编出故事,再勾画故事中的人物,可我不想仿效他们。我几乎想不出来一个故事,可以不需要人物来推动,也设想不出一个场景,可以不依靠身处其中的人物的性质,从而不依靠他们对待场景的态度,就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詹姆斯羡慕那些会编故事的作家,但坚持认为小说最应该倚靠的是人物。因此,现代批评家一向认为,詹姆斯的小说,特别是晚期小说,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外部行为。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不注重情节的安排。当小说有了人物之后,詹姆斯的下一步就是为他/她构建合适的场景和情节。在《画像》的序言中,詹姆斯接着说,

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费力的事’,是为某一件事煞费苦心,它的形式越宏大,所费的功夫就越大。所以,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就是为伊莎贝尔·阿切尔作一番费尽心机的安排。

詹姆斯曾援引屠格涅夫的创作理论说明人物的重要性,他说,“伊万·屠格涅夫曾经讲过自己的小说一般是如何萌芽的,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并珍视他这一番话。他的小说总是起源于一个或几

个人物,他们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或真实、或虚幻,都以他们本来的特点,用他们特定的方式,祈求着他,吸引着他,召唤着他。在他眼里,他们可以随时为他所用,可以安排到各种命运以及人生复杂的境遇中,一切都那么清晰。”可是接下来,“他就必须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关系,那种可以将他们完美地表现出来的关系;去想象、创造、选择、整合那些最有用、最足以说明这些人物的情境,那些他们最可能引起或感受的各种复杂情况。”屠格涅夫说,“找到这些东西,也就找到了我的‘故事’”。所以,詹姆斯虽然认为人物是第一位的,但并不忽略情节构建的重要性。在《虚构的艺术》一文中,詹姆斯指出人物与情节的不可分割性,“难道事件不是由人物限定的吗?难道人物不是由事件来展现的吗?”在纽约版序言中,詹姆斯经常用四个词来说明他所运用的叙事模式:图画(picture)、戏剧(drama)、故事(story)和情节(plot)。这四个词各有侧重,反复交替使用,在序言中频繁出现,可见詹姆斯对小说情节安排的重视。而在《悲剧缪斯》的序言中,詹姆斯直接说到,“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安排故事的情节具有莫大的快乐。”如同米莉森特·贝尔(Millicent Bell)所说,“尽管有人宣称詹姆斯的故事缺乏叙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ed.) Leon Edel.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1071.

同上, P.1073

同上, P.1077.

同上, P.1072.

同上, P.55.

援引罗伯特·卡萨里奥(Robert L. Caserio)的解释,图画似乎意味着通过某个人物的中心意识赋予现象以形式和意义的一种布局,它是一种分析的、沉思型的叙事模式,而不是动态地展现人物的行为。而戏剧指的是对现象的完全客观的表现。在卡萨里奥看来,戏剧是介于图画和故事、情节之间的一种叙事模式。而故事和情节则倾向于动态的、发展性的。参见 Robert L. Caserio, *Plot, Story, and the Novel: From Dickens and Poe to the Modern Peri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同, P.1111.

事,但詹姆斯并不承认他放弃了叙事的建构。”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詹姆斯的小说其实并非真的缺乏情节,只是他将人物外在的行动转化成了内心的意识活动。米莉森特·贝尔(Millicent Bell)认为,“詹姆斯对情节作了重新定义,把行动意义上的情节转变成了思考意义上的情节。”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也说,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意识的情节剧”代替了外在的情节剧。

可见,詹姆斯的小说尽管看似缺乏外部的情节,他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却煞费苦心。詹姆斯在多部小说中运用了亚里斯多德的叙事理论,设置了情节的逆转和人物的认知。本文将选取《画像》、《鸽翼》和《金碗》这三部詹姆斯公认的代表著作来说明这一点。三部小说同属于国际性题材,主要情节也比较类似,均讲述了善良富有的美国年轻女子在欧洲遭遇情感和金钱欺骗的故事。在这三部小说中,詹姆斯都设置了类似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情节上的逆转,而且如同亚里斯多德所说,情节的逆转均伴随着人物的认知,即从对阴谋的一无所知到知道。根据亚里斯多德关于认知的理论,还可以发现詹姆斯在三部小说中运用了不同的认知方式。在《画像》中女主人公偶然的发现引起了她一种特殊的感受,在《鸽翼》中是通过人物的内心推理,在《金碗》中则主要是借助于金碗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物品。

在《画像》的序言中,詹姆斯写道,小说的基石是“关于一个年轻姑娘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想法”。伊莎贝尔是一个独立自主、追求自由的女性,而她对自由的追求集中反映在她的婚姻选择上,这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在这一基础上,詹姆斯设置了情节的逆转和认知。

伊莎贝尔不顾世俗观念,在众多追求者中,放弃了富有的工业巨子和英国贵族而选择了既无财产也无地位的奥斯蒙德,相信与他的结合会享有最自由的生活。然而,奥斯蒙德看似高雅,与世无争,实则虚伪,觊觎名利。奥斯蒙德与默尔夫人曾是情人,并育有一私生女潘茜,因两人都没有财产没有结婚。当默尔夫人得知伊莎贝尔得到七万英镑的遗产时,就撮合伊莎贝尔与奥斯蒙德相识,好为自己的女儿潘茜获得一份丰厚的嫁妆。

伊莎贝尔对默尔夫人与奥斯蒙德的关系一无所知,以为她的婚姻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

在《画像》中,从第三十六章开始,情节出现了逆转:伊莎贝尔为追求自由而选择了奥斯蒙德,婚后却渐渐发现奥斯蒙德虚伪世俗的真实面目,他不能容忍妻子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要求她只能成为他的附属,反映他的好恶;伊莎贝尔坚信自己的婚姻是她自由选择的结果,却发现原来是默尔夫人一手操纵。而这一逆转,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是符合“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

小说情节的逆转伴随着人物的认知。认知的场景发生在第四十章,詹姆斯运用的叙事策略是亚里斯多德所阐述的第三种认知方式:主人公因为看到某个物品而引起一种特殊的情感。伊莎贝尔外出回来,偶然看到奥斯蒙德和默尔夫人在一

---

Millicent Bell, *Meaning in Henry Jam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2.

Peter Brooks,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Balzac, Henry James, Melodrama, and the Mode of Exc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58.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ed.) Leon Edel.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1076.

自由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例如,阿诺德·凯特尔(Arnold Kettle)认为《画像》的主题是“自由和独立”,“展现了伊莎贝尔自由观的欠缺。”见 Arnold Kettle,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Hutchinson'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21, 22. 安东尼·马兹拉(Antony Mazzella)在对比小说的两个版本时指出,“在将伊莎贝尔完善为一个新形象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强调了她的自由和脆弱性。”见 Anthony J. Mazzella, “The New Isabel”. In Robert D. Bamberg, (ed.) *The Portrait of a Lad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 598. 爱琳·桑托斯(Irene Santos)认为,“伊莎贝尔试图维持一种理想——把个人自由当作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基础。”见 Maria Irene Ramalho de Sousa Santos, “Isabel's Freedom: Henry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In Harold Bloom, (ed.) *Henry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New York and New Have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118. 关于伊莎贝尔的自由观与她的婚姻选择之间的关系,可参见陈丽:《伊莎贝尔的自由观》,《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起,“刚刚迈过客厅的门槛,伊莎贝尔停了下来,因为她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头。”她看到默尔夫人在里面,还戴着帽子;奥斯蒙德正和她说话。这种场景伊莎贝尔当然不是头一次碰到,但她第一次注意到,他们的谈话“眼下变成了一种亲密的沉默,而伊莎贝尔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闯入会吓他们一跳。”首先让伊莎贝尔感到好奇的是“奥斯蒙德坐着,而默尔夫人站着”,于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吸引了她。”接着是她发现“他们正在交换自己的看法,现在是临时停下来在各自心中盘算;他们面对着面,很放松,就像多年的老友那样,不言不语中彼此就知道了对方的想法。”这件事情“留下一种印象,只持续那么一会儿,就像是突然闪过的光线。”在这个场景中,奥斯蒙德与默尔夫人在一起的情景引起了伊莎贝尔一种特殊的感受,仿佛“突然闪过的光线。”这正是亚里斯多德所列举的第三种认知方式。伊莎贝尔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丈夫与默尔夫人关系暧昧。在潘茜的婚事风波后,她终于弄明白了:默尔夫人和奥斯蒙德休戚相关,利益与共;是默尔夫人操纵了她的婚姻,“这位聪明、坚强、果断而且老练的女人……在自己的命运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强势的角色。”而她以为“自己嫁给了这个世界上最纤尘不染的男人;结果这个人跟世俗的冒险家没什么两样,目标就是她的钱。”詹姆斯出色地描写了伊莎贝尔从一无所知到了解一切的认知过程,说伊莎贝尔“似乎正从一场贻害无穷的长梦中醒了过来。”如同阿诺德·凯特尔(Arnold Kettle)所说,詹姆斯要“有力地展现伊莎贝尔对其真实处境的逐渐了解”,而读者“需要分享伊莎贝尔从怀疑到觉醒的过程”。

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在情节的逆转和认知后,应该是受难的场景。伊莎贝尔在了解事实后双手掩面,喃喃道,“天哪,太不幸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还指出了悲剧所应达到的心理学效果,悲剧应当模仿能够引起怜悯和恐惧的事件,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宣泄,而“引起怜悯的是人物不应得的不幸。”在《画像》中,伊莎贝尔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对待,引起了读者悲剧性的怜悯,达到情绪的宣泄和净化。

《画像》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追求自由的人生而梦想破灭的故事,而在《鸽翼》中,密丽·斯蒂尔的人生愿望也无法实现。詹姆斯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小说的构思……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原本可以拥有丰富美好的人生,却年纪轻轻病魔缠身,将不久于人世,尽管她热爱并深深眷恋着这个世界。她明白命运对自己的审判,却热切地期望能在生命消逝之前更多地体验人生精微的震颤,从而获得哪怕是短暂的、断续的生活过的感觉。”<sup>①</sup>然而,密丽对生命的渴求却被凯特和邓歇尔的阴谋断送。凯特和邓歇尔倾心相爱,但两人却都没有财产。这时,天真、善良而富有的密丽出现了。当凯特发现密丽对邓歇尔深有好感且身患绝症时,一个计划就在她脑海中形成了。她让邓歇尔与密丽接近,期望密丽能与邓歇尔结婚,等密丽死后就可以继承她的大笔遗产。这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与《画像》一样,逆转出现在小说后半部,并且伴随着认知。

凯特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邓歇尔独自留在威尼斯,与密丽频繁见面,而密丽也从邓歇尔的爱情中获得了与病魔做殊死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情节的逆转出现在第三十章。马克爵士因向密丽求婚遭拒,出于报复的心理,来到威尼斯,告诉密丽凯特和邓歇尔的真實关系。至此,凯特的计划败露,原本已经点燃生命之火的密丽在绝望中孤独地死去,事件转向了其相反的方向。这一情节的逆转伴随着当事人的认知——密丽知晓了掩盖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1, P. 442.

同上, P. 443.

同上, P. 560.

同上, P. 566.

Arnold Kettle,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Hutchinson'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6.

同, P. 563.

①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ed.) Leon Edel.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1287.

在爱情帐幕之后的阴谋。这一认知的方式,是由于马克爵士的突然出现,向密丽吐露了凯特和邓歇尔的隐情。情节的逆转和认知都符合“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但是,詹姆斯在《鸽翼》中采取了更加复杂的叙述策略。他对密丽运用了间接描述的方法,将密丽的故事隐藏在凯特和邓歇尔的故事之后,两个故事相辅相成。因此,小说中呈现出双重逆转和双重认知。在小说中,密丽是中心人物,她的周围有凯特、邓歇尔、斯特林海姆夫人、洛德夫人、马克爵士、司特莱特医生等人。詹姆斯很少直接表现密丽,大部分情况下,读者是通过其他人的视角和意识来观察和理解她。在小说的序言中,詹姆斯这样总结对密丽的处理方式:

我很少直接表现密丽,而是尽可能地采取迂回的途径,间接地表达她,就像我们面对一位纯洁无暇的公主时那样。她的作者温柔的笔触……使他的观察只能通过别人对她的关注,宛如透过一扇扇排列的窗户。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显得消极、被动、诗歌般飘渺,而凯特和邓歇尔却更加主动,更充满激情。密丽直到第三卷第五章才出场,在小说结束前的一百多页就退出了读者的视线。即使是在中间的一部分,也大多徘徊于背景地带,让凯特和邓歇尔占据前台位置。密丽从来都不像凯特和邓歇尔他们那样清晰、确定,而是显得模糊、朦胧。詹姆斯用一枚悬挂的勋章形象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密丽的故事和凯特邓歇尔的故事比作勋章的两面:“它的正面和反面,将供观察者自由选择。”詹姆斯选择了反面。于是,我们看到,密丽越来越依赖于周围人对她的理解来表现,直到最终消失。詹姆斯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没有密丽所置身其中的因素,就无法深刻地表现她……如果她所处的痛苦状态只不过是她生活的一半,相关的另一半则是那些影响了她的生活的人。”在《鸽翼》中,密丽·斯蒂尔这一中心人物依靠多重交错的视角折射展现。如同约翰·卡洛斯·洛(John Carlos Rowe)所说,“试图靠近密丽的任何努力都把我们带到她身边的那些人。”

因此,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是双重的逆转和

认知。凯特寄希望于邓歇尔与来日无多的密丽结婚从而获得后者的大笔遗产,她的计划因马克爵士的嫉妒而破产;而另一方面,密丽渴望能从邓歇尔的爱情中获得延续生命的力量,这一愿望也未能实现。与情节上的双重逆转伴随的是人物的双重认知。詹姆斯并没有直接表现密丽的认知,而是将密丽的认知隐藏在邓歇尔的认知之后,对后者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马克爵士如何见到密丽,如何向她说明凯特和邓歇尔的计划,读者一无所知。而密丽在得知真相之后的伤痛绝望之情也只能凭借读者的想象去揣测,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是斯特林海姆夫人在风雨交加中造访邓歇尔的旅馆时所说的那句话,“她将脸转向了墙。”相反,詹姆斯悉心描写的是邓歇尔的认知。邓歇尔在威尼斯陪伴密丽,两人的关系进展得很顺利。可是有一天,当邓歇尔来到密丽在威尼斯租住的宫殿时,却被告知密丽不会客:

看来,两位女士都不会客,而帕斯夸里并不准备说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身体不适,也不准备说她们并无大碍。邓歇尔看到,帕斯夸里好似一个空白——如果这个词适用于这个民族。对他们来说,空白并非空洞的表面,只不过是黑暗的巢穴,一个退隐的地方,那里存在着某种模糊的、不祥的东西。”

这里,詹姆斯用空白一词来说明邓歇尔的一无所知。整整三天,邓歇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使情况突然出现了逆转。他在凄风冷雨中等候任何可能的消息,却甚至没有一张来自密丽寓所的便条,直到他在广场的一间咖啡馆里偶然看到了马克爵士,于是一切都明了了。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French Writers, Other European Writers, the Prefaces to the New York Edition*, (ed.) Leon Edel.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1303. 同上, P.1292.

John Carlos Rowe, *Henry Adams and Henry Jame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78.

Henry James, *The Wings of the Dove*. Konemann. 2000, P. 443. 同上, PP. 432-433.

在这个认知的场景中,詹姆斯采用的是亚里斯多德所归纳的第三种认知方式,也就是主人公的推理。邓歇尔在人群中辨认出马克爵士的“整个过程不过只有几秒钟……可在这短短的停顿中,他似乎已经抓住了谜团的答案……两人都认出了对方(recognition),却没有互相致意。”对邓歇尔来说,认出马克爵士意味着他也获得了密丽拒绝见他的原因。他很快想到,

他【马克爵士】只是作短暂的拜访,马上就要离开……他回来是有目的的,是他上一次拜访的后续;不管他回来是为了什么,他已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也许他只是昨天晚上,或当天早上才到,可是他已经改变了一切……令人费解的事情现在一清二楚了……那个人已经达到了他来此的目的,现在,他满足了。他回来是要见密丽,密丽接待了他。他的拜访也许就在午饭前后,而这就是为什么密丽的大门对他【邓歇尔】关闭。

对邓歇尔来说,这答案是如此重要,他“紧紧地抓着它,抱紧它,依靠着它。”而“弥漫在空气中的罪恶仿佛命运的气息。天气已经变了,雨恶风邪,大海也让人无法忍受,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马克爵士。詹姆斯精湛地描述了邓歇尔的认知过程——他通过推理和判断获知了事情的真相。而密丽的认知,尽管詹姆斯没有直接描述,也通过邓歇尔的认知间接呈现。在《鸽翼》中,天真善良的密丽却遭此厄运,引起读者的怜悯之情,使小说具有亚里斯多德式的悲剧意味。

《金碗》是詹姆斯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在情节上也与《画像》和《鸽翼》相似,讲述了天真善良的美国女子麦琪被自己的好友和丈夫欺骗的故事。与前两部作品一样,詹姆斯也运用了逆转和认知的叙事策略,而认知的方式则是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所列出的第一种,即通过某个标记物所引发的认知。

在《金碗》中,家财万贯的费弗携女在欧洲游历,搜寻古董珍玩,也为女儿寻到一位如意郎君——意大利没落贵族亚美利哥王子。亚美利哥王子和夏洛特原本相爱,但两人均没有财产而无法结婚。与前两部不同的是,亚美利哥在与麦琪相识之前已与夏洛特分手。之后夏洛特又与麦琪

鳏居的父亲结为连理,也成为费弗家的一员。费弗父女仍旧相依为命,继母与女婿却旧情复燃。在小说开头的第五章,夏洛特从美国远渡重洋来到英国,为的是要在亚美利哥结婚前与他再见一面,“能够度过单独的一个小时。”而她对爱辛海姆夫人所说的借口是要为麦琪买一件结婚礼物。两人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的古董店里搜寻了很久,最终在一家小古玩店里看到了一只镀金的水晶碗。夏洛特想买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亚美利哥,而后者出于自身考虑没有接受。在店里两人用意大利语交谈,以为店主无法听懂,哪料店主精通意大利语,从他们的谈话中已经知悉二人关系密切。因二人面容姣好,举止不俗,店主对他们印象深刻。

情节的逆转出现在第三十三章。多年后麦琪为给父亲准备生日礼物,偶然来到当年的旧情人去过的古玩店,也被这只金碗所吸引,出高价买下了这只镀金碗。店主后来内心歉疚,想要退回多得钱款,于是造访麦琪的住处,从照片上认出了亚美利哥王子和夏洛特。麦琪从而知道了丈夫和继母的去,证实了许久以来萦绕心头的疑惑。这里,情节的逆转伴随着人物的认知,又都在情理之中,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要根据“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要求。

在《金碗》中,詹姆斯采取了亚里斯多德所总结的第一种方式来表现麦琪的认知,即借助于某个标记物所引发的认知。在这部小说中,标记物是那只金碗。当然,在麦琪得到那只金碗之前,她已经对继母与丈夫之间的默契心存疑虑。例如,在夏洛特加入费弗家后不久,麦琪就敏锐地察觉到,她的继母和丈夫“计划一致,似乎在对付她,在与她较量着……而他们的计划与她的计划完全相悖。他们不是从她这里,而是通过彼此获取某种信号或暗示,而这正是让她寝食难安的。他们行动一致,

Henry James, *The Wings of the Dove*. Konemann, 2000, P. 437.

Henry James, *The Golden Bowl*.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5, P. 57.

默契有加，他们的行为、表现和语气都相互契合……”而这个想法“就像闪电一样划过她的内心，如同黑夜中开出的硕大花朵。”这里，詹姆斯用夜空中的闪电来描述麦琪走出无知、面对事实的惊惧之情，而金碗的出现则完成了她的认知过程。

因此，金碗在小说的情节构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只镀金的水晶碗是小说最核心的象征，那条细微的裂痕象征着麦琪婚姻潜在的危机。关于金碗的寓意，过去已有很多研究，然而，如果我们从詹姆斯的叙事策略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金碗在小说结构上的独特作用。金碗在小说中出现两次，如前所述，首次出现是在开头的第五章。借助于金碗，詹姆斯向读者交代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夏洛特和亚美利哥的前情，这就为整部小说的情节展开设定了基础，为后面的戏剧冲突埋下了伏笔。金碗在第三十三章第二次出现，成为引起主人公认知的重要物品，引发了整个情节的逆转，将戏剧冲突带向高潮。

逆转和认知的设置说明詹姆斯在情节构建方面的出色技巧。在英语中，plot 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情节；一是密谋、策划。在这三部小说中，都有一个阴谋家(plotter)的角色，设计欺骗女主人公的感情、谋取她的钱财。除了詹姆斯这个小说情节的安排者，还有小说内的 plotter。在《画像》中，阴谋家是默尔夫人。在《鸽翼》中，是凯特谋划一切，如同尼科拉·布莱德伯瑞(Nicola Bradbury)所说，“凯特具有小说家的想像力。”而在《金碗》中，plotter 的角色已经很模糊，更接近于小说家

的意义。费弗家的老友爱辛海姆夫人促成了两对婚姻，却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小说后半部的麦琪则更像一个将各个人物置于自身掌控之下的小小说家。小说内的 plotter 与詹姆斯这一小说外的 plotter 相互映照。

#### 四、结语

情节是叙事学的重要内容，在《画像》、《鸽翼》和《金碗》中，詹姆斯均设置了情节的逆转，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人物的认知。亚里斯多德认为，逆转和认知相结合会引起出其不意的效果，使读者产生怜悯或者恐惧的情绪，因而是构成好的情节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此理论来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叙事策略，说明詹姆斯不仅擅长对人物心理的细微探索，也精于故事情节的构建。亚里斯多德在古希腊时期提出的叙事理论，在詹姆斯这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小说家的创作中得到精彩演绎。

(责任编辑：言顺)

Henry James, *The Golden Bowl*,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5, P. 268.

Nicola Bradbury, *Henry James: the Later Nove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 77.

例如，乔纳森·弗雷德曼(Jonathan Freedman)说，“小说的主要象征金碗意味着詹姆斯的创作行为与他的人物麦琪之间的相似性。”见 Jonathan Freedman, *Professions of Taste: Henry James, British Aestheticism, and Commodity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1.

## Aristotle's Poetics and Henry James's Narrative Strategy

CHEN Li

**Abstract:** Plot is the central part of modern narratology. In *Poetics*, one of the earliest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ristotle proposes the concepts of reversal and recognition in plot, claiming that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for constituting a good plot in tragedy. This paper, from the aspect of Aristotle's literary theory, discovers that James, in his three representative works – *The Portrait of a Lady*, *The Wings of the Dove* and *The Golden Bowl*, employs the Aristotelian technique of reversal and presents recognition in various ways as summarized in *Poetics*, revealing James's narrative art in plo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ristotle, Henry James, plot, reversal, recognition